古国寻踪

——三星堆文化的兴起及其影响

江章华 李明斌 著

A0979562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序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两座器物坑的发现，极大地震动了中外学术界。原来一向被认为只是到战国时期随着蜀国的崛起方出现经济、文化飞跃发展的成都平原，竟然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便建立了王权国家，产生了灿烂夺目的青铜文化。这一突如其来的发现，怎么能不在学术界尤其是历史考古学界引起震惊和关注呢？其实，回溯一下四川考古的历史便会知道，两座器物坑的发现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该地区就曾发现过玉圭、玉璋、玉琮、玉璧等礼仪用玉。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多次发掘，又出土了丰富的文化遗迹和遗物，证明广汉三星堆一带确是一处范围广大的古代遗址。两座器物坑中的奇珍异宝，过去虽不曾露面，但它毕竟是该遗址的有机组成，它们的发现并非不可思议。

然而，关于这两座器物坑的时代、性质、文化归属与族属，其在整个三星堆遗址中的地位，所反映的社会历史内容，以其为代表的三星堆文明的来龙去脉以及与其他文明的关系等

重要学术问题，都随着它们的发现提了出来，都需要给予认真思考、研究和回答。

当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决非轻而易举。首先，最重要的是需要对该遗址和其他相关遗址进行有计划的发掘。这项工作从1986年至今一直不曾间断。三星堆的土坯城墙、墓葬、窑址、房基和包含物丰富的文化堆积的发现，成都平原以宝墩古城、郫县古城等为代表的宝墩文化的发现，成都十二桥遗址的发现……都为这些问题的回答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但同时也必须开展以消化考古材料为重心的各方面的综合研究，包括对有关文献史料的研究，否则，回答就很可能是片面的、有欠缺的。

面对道道充满魅力的历史难题，许多人都在积极应答。摆在我案头的由江章华、李明斌执笔的《古国寻踪》书稿，便是众多应考者的答卷之一。我不敢说逐字逐句地做了研究，但毕竟是用了两天时间通读了一遍。在这部著作中，作者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三星堆遗址和相关遗址发现、发掘的历史；归纳了方方面面的研究成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依据所发掘的材料，并结合历史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围绕两座器物坑和三星堆文明诸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中关于三星堆遗址的分期；三星堆文化来源于宝墩文化又相继发展为十二桥文化、晚期蜀文化；三星堆两座器物坑宝藏是三星堆文化阶段国家宗庙重器，后被取而代之的十二桥文化阶段人们毁坏掩埋；器物坑中出土的青铜器分别为被祭祀神灵、致祭者的形象和用于祭祀的礼器与仪仗；成都羊子山土台的始建年代和性质等问题的论断等均有新意。关于蜀文化研究相关问题的思考也发人深思。

这份答卷是不是对上述问题最好的回答我不知道，但在我看过的一些相关著作中，我认为《古国寻踪》是一部对成都平原从新石器时代到战国时期诸考古学文化进行了系统梳理并作了相当深入研究的著作。这是在基于汉人扬雄《蜀王本纪》和晋人常璩《华阳国志·蜀志》等文献史料写成的古蜀历史之外，在研究了大量考古材料基础上构建的另一部古蜀历史。因为它依据的史料是古人活动时遗留下来的实迹和实物，因而也就更具有可信性。阅读过这部书的读者，对文献记载的蜀人历史可能还会半信半疑，但一定不会再怀疑成都平原自古以来就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就有发达的新石器文化和青铜文化，就曾产生过与中原商王朝并驾齐驱的古国，到秦汉时期才最终融入统一的文化体系。该书的写成与出版，为重建中国上古史特别是上古史的西南篇，奠定了一块厚厚的基石，这是可以肯定的。

我们追求的学术研究的最佳境界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任何学术问题的回答决不会“舆论一律”。江章华、李明斌二位先生在该书中的种种论断，有些是大家一致的意见，有些得到了较多学者的赞同，有些也难免会有这样那样不同的看法。但不论属于哪一类，都尚有继续研究的必要，而且当你解决了一个问题的时候，也是提出新的研究课题的时候，学术研究永无止境。江章华和李明斌都是年轻有为之士，我相信一定会在这部专著问世之后，围绕其中已经涉及的或即将提出的一些关键问题，穷追不舍，继续钻研下去，不断作出自己新的回答。

李伯谦　2000年5月17日



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国学研究丛刊之十五

三星堆文明丛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三星堆文明丛书

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国学研究丛刊之十五











封面设计制作
Wen Xiaoniu 文小牛

目　　录

第一章　三星堆文明的发现与探索……（1）

一、惊世之发现……（2）

二、探索者之路……（9）

三、研究之现状……（43）

第二章　三星堆文明的基础——宝墩文化……（58）

一、宝墩文化的发现与认识……（59）

二、宝墩文化的年代及其变迁……（67）

三、宝墩文化的成就及其对三星堆文化的影响……（74）

四、宝墩时期的社会——文明的孕育时期……（82）

第三章　辉煌的三星堆文明……（86）

一、三星堆文化的形成及外力作用……（86）

二、三星堆遗址与三星堆文化……（90）

三、埋藏坑的发现……（99）

四、埋藏坑的年代与性质……（105）

五、独具魅力的青铜艺术……（113）
六、精美的玉石礼器……（141）
七、三星堆文化时期人们的信仰体系……（146）
八、三星堆古城……（153）
九、三星堆文明与商文明……（158）
第四章　三星堆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十二桥文化……（168）
一、十二桥文化典型遗址的发现与分析……（168）
二、十二桥文化对三星堆文化的继承与发展……（174）
三、十二桥遗址群的聚落网络体系……（183）
四、青铜文化发展的新阶段——彭县窖藏青铜器……（186）
五、十二桥文化的对外交流与扩张……（194）
六、占卜习俗……（198）
七、人神沟通之圣地——羊子山土台……（208）
第五章　最后的辉煌——战国青铜文化……（220）
一、辉煌的战国青铜文化……（221）
二、四川战国青铜文化的分期与年代……（232）
三、四川战国青铜文化因素的分析……（242）
四、巴蜀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254）
五、关于四川地区战国青铜文化的命名……（255）
六、巴蜀文化研究相关问题的思考……（258）
附　录　三星堆文化研究论著（1933-1999年）……（278）
后　记……（292）

第一章　三星堆文明的发现与探索

巴蜀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中华古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三星堆文明又是巴蜀文化中最为璀璨和辉煌的篇章。

位于四川盆地西部的广汉三星堆遗址，东西长约3公里，南北宽约2公里，是由三十多个地点组成的长方形遗址群。中部地区以半月形的月亮湾台地为中心，南部隔马牧河是三星堆遗址，北部临鸭子河有西泉坎等遗址，西部横梁子遗址上有一条西南～东北向的土埂，连接着马牧河和鸭子河，东部狮子闹遗址有一道南北向的土埂。这些远古的遗址犹如点点繁星，加上神秘的“三星伴月”的传说，给富饶而美丽的川西平原带来了凝重的历史沉淀。

一、惊世之发现

三星堆遗址并不是近年刚发现的，而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早期发现之一。20世纪20年代末，三星堆遗址玉、石器物的出土堪称中国近代考古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下面就让我们重温三星堆文明的发现历程，去感受那一幕幕激动人心的时刻吧！

四川广汉市南兴镇北面有一条小河，当地人称为马牧河。1929年春天，中兴乡（今南兴乡）农民燕道诚在马牧河北岸一处被称作月亮湾的月牙形台地上清理水沟时，从沟底偶然挖出一批玉、石器，其中有玉圭、玉璋、玉琮、石斧及石璧等，总数达四百余件，随即掩盖，夜深掘出搬至家中，秘藏不宣。数年之后，这批玉、石器流入市场，“ 广汉玉器 ”从此名噪一时。

1933年冬，由华西大学博物馆（今四川大学博物馆）的两位资深学者，美国的葛维汉教授和林名钧教授带领的考古队，在月亮湾作了为期10天的考古发掘（关于此次发掘的时间，有1932、1933和1934年三说，本书从冯汉骥、童恩正之说）[1]。以此为端，开始了古蜀文明考古工作者与研究者们长达七十年的漫长而坚韧的探索之旅。此次工作，开了长40、宽5英尺（约合12×1.5米）探沟数条，发掘中把地层划分为农耕土、文化层和生土三个层次，虽然对厚约1米的文化堆积层未能按土质土色再进行细分，但在当时仍不失为较为进步的

田野发掘方法。这次发掘出土石器、陶片及玉器等文物600余件，发掘者认为其年代最晚可到周代，早期可能到铜石并用时代。到次年4月，葛维汉编写的对广汉古蜀文明遗址的第一次考古发掘报告《汉州发掘简报》完成，发表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1933～1934年第六卷上[2]。这是在四川做的第一次正式考古发掘，时为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发展和史前考古活动蓬勃兴起的时期（1931～1937年）[3]。这次考古活动，对于认识四川的古代文化颇有影响。

当时旅居日本的郭沫若在1934年7月给林名钧教授回信称：

> 很高兴接到你和葛维汉先生的信，谢谢你们的好意，送给我如此多的照片、图片以及戴先生发表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上的文章，并且告诉我有关发掘的详细情况。你们真是华西科学考古的先锋队。我希望将来你们能取得更大的成绩，研究古代的遗迹和建筑、雕刻、坟墓和洞穴。这一工作将产生丰硕的成果。与此同时，我也希望今后会有一系列的发掘以探索四川史前史，包括民族、风俗以及它们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接触的历史。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我很遗憾，我不能归国协助你们的发掘。
>
> 你们在汉州发现的器物，如玉璧、玉璋、玉圭均与华北、华中发现者相似。这就是古代西蜀曾与华中、华北有过文化接触的证明。“蜀”这一名称曾先发现于商代的甲骨文，当周人克商时，蜀人曾经前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相助。此外，汉州的陶器也是属于早期的类型。你们认为汉州遗址的时代大约是西周初期的推测可能是正确的。如果将来四川其他的地方尚有发掘，它们将显示出此文化分布的区域，并提供更多的可靠的证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川的数代考古工作者们继续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和探索。这一探索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50年代，田野调查阶段。1952年，四川省博物馆王家祐收集当年出土的一批玉琮、玉瑗、玉钏和玉磬。1956年春、秋季，四川省文管会田野组在新繁、广汉进行调查，采集、征集到玉璋、玉琮、玉镞、石斧、石璧等物。调查者认为新繁水观音、广汉月亮湾横梁子和三星堆是“ 新石器时代的遗址 ”（前言）或“ 相当于殷商时期 ”（结语）[4]。1958年，四川的考古工作者又在这一带进行过调查，收集到部分玉石器。

第二阶段，六七十年代，田野调查、发掘并举阶段。1960年6月，四川大学历史系对月亮湾、真武宫南面附近一带进行了调查，采集有陶盖钮、器流、尖底杯、盘、小平底罐、豆柄和石斧、锛、璧等，其时代上限可至西周初，下限不晚于春秋之初[5]。1963年，四川大学历史系、四川省博物馆考古队在冯汉骥教授带领下再次发掘了月亮湾遗址，共开探方12个。这次发掘选在三个地点进行，重点在燕家住宅附近，发掘面积最大，堆积较厚，包含物丰富，反映了该次发掘的主要收获；

真武宫地点包含物与燕家住宅点相同，但数量甚少；月亮湾横梁子地点汉代层下的两层出土遗物同于燕家住宅点第3层。该次田野工作中把文化层按土质土色分为上、下两层，还发掘、清理了3组房址、6座墓葬，出土陶片3万多片。将年代定为商代与西周。其时，冯汉骥先生站在月亮湾台地上，遥指对面的三星堆遗址说：“ 这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就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 ”1964年，在距原发现玉石器的地点50～60米处，又发现石器一坑，有成品、半成品和石坯[6]。1974年，在附近梭子田又发现一坑磨石，青黄似玉，坚硬细腻，均有使用面。1976年，在高骈公社机砖厂出土玉斧、玉刀和玉矛各1件[7]。

第三阶段，八九十年代，大规模、连续科学发掘阶段。1980年，考古工作者经过勘探，发现距月亮湾不远的马牧河南岸一处当地人称三星堆的地方也分布有重要古代文化遗存，并于当年开始了对三星堆遗址长达20年不间断的发掘。1980年5月首先进行了试掘。1980年11月至1981年5月进行了第一次发掘，发掘地点在三星堆东北侧，共开探方49个，揭露面积1225平方米。80年代的首次发掘就第一次在成都平原上清理出商周时期的房址18座，分木骨泥墙式和穿斗夹壁式，并用航片记录下了这一地点早、晚两期打破的建筑群，还发掘出土灰坑3个、墓葬4座、窑址1座，出土标本上万件。发掘简报已刊载。1982年配合砖厂取土，在三星堆西南300米处进行第二次发掘，发掘面积约100平方米，文化堆积分上下两层，下层同第一次发掘的第三期，上层新出现细泥尖底杯、尖

底罐等器形，与新繁水观音遗址所出相同，被划为三星堆遗址第四期。经测试，第一期年代为距今4500～4000年，第二、三期距今4000～3200年间，第四期距今3200～3000年。1984年在西泉坎发现了与新繁水观音相衔接的地层叠压关系和出土遗物，完善了巴蜀文化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同年还在三星堆地点出土了相当数量的二期或三期文化的典型器物，在三星堆土堆下部发现了一层文化堆积，并确定土堆为人工堆积形成，结合遗址东部、西部类似土埂，初步推测其为早期城址或建筑基址。1986年，四川省文管会和四川大学联合发掘，共开探方59个，发掘面积1335平方米，清理房址9座、灰坑101个，出土数量众多的文化遗物，对于全面了解三星堆遗址的地层堆积情况、文化内涵、特征、时代、分期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1986年两处埋藏有丰富宝藏的长方形坑被意外揭露出来。这两个坑中，堆放着大量巨型青铜人头像和全身像，与之共出的还有成堆的其他铜器、金器和玉石器，如青铜尊、罍、神树、金杖、金鱼、玉璋、玉戈、石矛、石戈和石璋等，惊人的发现，再次轰动了世界。这两座祭祀坑的发现，表明三星堆遗址是蜀国早期的政治、经济中心。由于两座器物坑的发现，其包含大量的金属器的出土，由此引发了海内外学术界对位于中国西南的古蜀文明的重视，一时间，世界各大传媒竞相报道，同时，有关三星堆文明，尤其是两个器物坑的研究文章与学术观点纷纷涌现，一改以往相对沉闷的面貌，使三星堆文明的研究呈现出一派新的气象，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对古蜀文化研

究的进程。

1988年开始，文物考古工作者对三星堆遗址内东、西、南三面的土埂先后进行了6次发掘，发现了中国城墙建筑史上使用年代最早的土坯垒筑城墙，东城墙长1100米、西城墙长600米、南城墙长1100米，并确定三星堆遗址城墙的修筑时期相当于商代早期。城墙外侧有壕沟，东、西城墙壕沟的南、北两端分别与马牧河和鸭子河相通，南城墙的壕沟两端分别与马牧河上、下游相接。在遗址北面未发现城墙，可能是以鸭子河为天然屏障。从而推知三星堆古城是以鸭子河为天然屏障、以河道和城墙互相结合的防御体系。这些重要发现，对认识三星堆遗址的性质、研究早期蜀国的地望及蜀国古代文明等学术课题，均具有重要意义。

历年来的勘查表明，古城址的总面积2.6平方公里，与郑州商城相当。在古城的中轴线上，从南向北分布着三星堆、月亮湾、真武宫、西泉坎等四处文化堆积丰富的台地。两个器物坑都位于这一中轴线上。古蜀国都城的政治中心——宫殿区应在月亮湾、真武宫一带高地上，南面的三星堆一带可能就是供奉神灵、祭祀先祖的庙坛所在地。东、西城墙距中轴线各约1000米，作为中心区的屏障。调查、勘探和试掘表明，三星堆遗址是商代早期蜀国的都城所在地。如此宏伟的古城，堪与同时期作为商王朝中心的二里冈商城相媲美，反映出三星堆古城时期已有雄厚的经济、文化实力。这些发现足以证明，商代的四川地区主要是三星堆文化分布区，三星堆古城是古蜀文明的中心。

为了了解三星堆遗址与周围地区古文化遗存的关系，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文物考古工作者在三星堆遗址周边的广汉、什邡等地区进行专题调查，发现了广汉烟堆子、毗庐寺、金鱼村、金华村、大堰及什邡马井乡等一批与三星堆遗址文化面貌基本相同的古代遗存，为开展三星堆地区聚落群体形态的研究打下了基础。近年在勘测时，又发现在遗址中部、西部还有若干道城墙，其时代和筑法不尽相同。在城址以西，发现早期墓群，清理土坑墓和埋祭坑20余座，出土物与三星堆一期或二三期均不太相同，给三星堆文明的研究提出了新课题。1999年春，发掘月亮湾和城墙，发现属于宝墩文化的地层叠压关系，使宝墩文化分期有了直接的层位依据，同时发现宝墩文化向三星堆文化过渡的地层，认识了宝墩文化典型器物消失和三星堆文化典型器物产生的交替过程[8]。此次工作是四川早期考古学文化序列建立的又一次重要进展。

三星堆古城和大量遗迹、文物的发现，证明三星堆文化繁荣时期在这里已经形成了一个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中心。正如苏秉琦先生曾指出的那样，从这里“看到了四川的古文化古城古国[9]”。

筚路蓝缕，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与探索，代表着一支已经湮没数千年的古代文化精华被发现和证实了，这支考古学文化有灿烂的物质文化和出神入化的艺术，它们留给后人的不仅有不朽的物质文明，还有蜀族集团的艺术灵魂。

二、探索者之路

70年间，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从未间断过，对三星堆文明的研究也从未停止过，而且研究工作伴随着田野发掘工作的进展、资料的不断公布、发掘方法的更加科学而逐渐细致、全面和深入，研究的手段与领域也随着考古学学科的发展而不断得到创新和拓展。70年来的学术发展证明，三星堆遗址群的发现与研究使巴蜀文化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回顾70年的研究历程，在中国考古学这一大的发展历史和背景下，可将四川学者对三星堆的研究归纳为以下几个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时期有其鲜明的特征。本书将不同时代的研究成果分成论文和专著两大部分。

（一）三四十年代，三星堆文明研究的肇始期

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对月亮湾地点出土的玉石器及玉石器坑的地层、时代、类型、性质进行的初步探讨，在国内外发表了不少文章和论著，让世界首次了解了商周之时中国西南的广汉文化。

1934年，华西大学博物馆美籍教授葛维汉发表了《汉州发掘简报》[10]。在文中，他写道：

> 燕家附近的一个小山旁，有个大半圆形弯曲地，好似一轮明月，名叫月亮湾。南面较远处有座小山，有三个小圆丘，把它们视作星座，称这些土墩为三星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